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New Frontier: Constructing Modern China's Borderlands.* By JUDD C. KINZLE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ix + 234pp.

自2000年以來，西方的新疆研究學術專著大約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2016年卻出版了至少五部關於新疆研究的著作，可以稱為是一個轉捩點。多語言文字材料的使用、環境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視角的引入等，都是這些新論著的特點。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歷史系金家德(Judd C. Kinzley)博士於2018年出版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New Frontier: Constructing Modern China's Borderlands* (《自然資源與新邊疆：建設現代中國的邊疆地區》) 一書。在書中，作者以全球史的視角，揭示晚清民國時期新疆的礦產資源開發與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政權建設、未來國家規劃、俄國(蘇聯)與中國外交等方面的關係，並引用「層」(layer)的概念對資源開發所塑造的這些關係及其歷史發展的過程進行闡釋。

在第一章，作者提出本書要討論的核心問題是「20世紀清政府以及民國政府沒有能力或不願意對新疆進行投資的這種行為，對於塑造這一邊疆地區與中央政權的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作者指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各方權益的代理人(新疆的省級官員、地方精英、各帝國權益的代理人、中國中央政府官員和國際市場的代表)對新疆資源的渴望與博弈，不僅決定國家行政機構在新疆的設置和發展，而且影響新疆與中央政府、鄰國乃至世界之間的聯繫。不僅如此，為生產、加工和運輸新疆的資源財富而建立的基礎設施，塑造20世紀新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形態。

本書第一部份的主題為「獲利豐厚的產品和對利潤的追求」，內容包括第二章到第四章，主要講述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新疆的農業、黃金和石油的開發，以及這些商品與國際市場逐漸聯繫起來的過程。

1878年左宗棠收復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地區後，提出農業復墾的政策，但是受限於帝國的財政危機，成效有限。與此同時，廣泛傳播的現代國家觀念、「實業救國」思想，促使新疆地方的官員調整他們的關注點——從農業轉向當地的非農業資源，期望依靠邊疆地區的資源財富減輕清政府財政的壓力。然而，礦產資源的開發，需要資本的投入。1896年，饒應祺任新疆巡撫之後，曾努力推行「民採官買」的採礦模式，但由於開發規模有限，轉而向俄國尋求資金和技術的援助。直到1917年，俄國地質小組和中俄開採公司才

對新疆北部那些礦產資源豐富的地點進行調查和投資。作者認為，與外國投資者的接觸是新疆礦產資源開發的重大轉變，對新疆礦產資源的分佈和儲量的發現都具有重大的影響。這些已經被勘探和投資開發的礦產資源點可以被視作零散的「層」，它不僅吸引本國和外國投資者前來開採礦山和油田，還讓這些礦產資源分佈區的重要性逐漸彰顯出來，越來越容易受到中央政府、勘測隊和外國投資者的注意，進而使這些地區更易於被投資和開發。

另一方面，19世紀末以來，俄國和蘇聯不斷改善其境內的交通運輸網絡，特別是1929年土耳其—西伯利亞鐵路的完工，不僅深刻影響歷史悠久的中俄皮毛貿易格局，而且使蘇聯的力量更大程度地滲透到北疆地區，確定全球貿易體系中北疆未來商品貿易和礦產資源開採模式的輪廓。作者繼續用「層」的概念進行分析，指出新疆與蘇聯合作建立的礦產資源開發的基礎設施和機構，吸引着勘測者、投資者和國家規劃者持續關注新疆的資源開採，鞏固和加強20世紀初基於北疆資源地點之上形成的「碎片層」(fragmentary layers)，並且將這些「碎片層」組織成一個與蘇聯緊密相連的區域網絡。

本書第二部份「工業礦產與新疆轉型」包括第五章到第八章，是本書的核心內容，主要講述20世紀30年代至今新疆的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以及這種過程對現代新疆產生的持久影響。

20世紀30年代，新疆省政府採取反腐敗運動、超發貨幣、開採金礦等策略，以應對財政危機，但是成效並不顯著。作者指出，在1941年德軍入侵蘇聯的形勢下，蘇聯的經濟重心東移，促成蘇聯與新疆省長盛世才的新聯合，新疆的礦產資源分佈的調查被列為重點專案。隨後，蘇聯加大對新疆的技術人員和物資的輸入，不斷加強對新疆礦產資源的勘探和開採。在此期間，蘇聯投資建設的煉油廠、礦廠以及相應的鑽井平臺和管道網絡，都成為未來採礦選址時優先考慮的要素。與此同時，中蘇合作修建從東部的哈密經伊犁抵蘇聯西部邊境的東西交通主幹道。這條幹道不但連接新疆境內主要的礦區，而且使蘇聯境內的交通網絡和新疆的交通網絡連在一起，為新疆礦產資源的出口提供極大的便利，促使新疆的礦產資源和商品運往西方市場的費用遠遠低於運往內地的費用。

20世紀40年代初，國民政府也開始參與新疆礦產的調查和開發。在資金缺乏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將開發的重點集中於已經那些被蘇聯地質學家廣泛調查過、有一定開發基礎的礦場。因此可以說，蘇聯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起的礦產資源調查、開採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行為，幫助和引導中華民國政府在新疆的進一步資源開採活動，甚至間接引導未來中國在新疆的投資佈局。

作者由此總結，晚清以來，每一個政權都期望在盡可能減少勘探和採掘投資的情況下，開發新疆的礦產資源，後繼政權都會在前人的基礎上，增加自己的投資並獲取利益，這種投資與影響相互作用，連續不斷，從而使得新疆北部資源開發積澱形成的「層」產生深遠的影響力。

20世紀50年代前期，中共規劃者在蘇聯的影響下，將新疆的發展重點集中在重工業和原材料生產的投資上。因此，1950年代以來，國家權力在新疆的塑造過程和塑造方式，除了通過建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加強邊境防禦和協助生產之外，就是通過中央政府投資開發該地區的資源，逐漸形成定居的人口，設立行政機構。「大躍進」期間，阿爾泰山脈各地的礦場被逐漸開發，塔里木盆地的石油礦產也被有計劃地進行勘探。但是，由於礦產資源不可再生的特性以及新發現的開採點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備等原因，「大躍進」之後，國家計劃的制定者還是將礦產資源開發的重點轉移回北疆克拉瑪依——獨山子油井這種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備的地點。作者認為，這是晚清以來在克拉瑪依、獨山子和可哥托海進行的系統調查、資本投資和發展基礎設施所形成的「層」產生的深遠影響。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家對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屬的重視與投資，塑造南北疆的社會經濟地理的差異，同時也加強國家投資和國家權力塑造現代新疆的層次性。2000年以後，中國政府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將70%的政府固定投資注入新疆北部，以期用較低的財政投入促進生產。這更進一步說明早期「層」的持久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有必要從國家權力、投資規劃以及經濟發展的區域分佈這些方面來切入，解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區域社會問題。

金家德最後指出，近代邊疆地區的資源、資源開採投資、經濟發展這三者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發展規劃之間存在着根深蒂固但往往被忽視的聯繫。作者強調，除了新疆之外，近代以來外國資本對中國臺灣、東北、西南等地資源開發的影響，也極大地改變當地的樣貌，特別是交通設施，形成中國邊疆地區獨特的「層」，進而持續塑造着整個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地理的格局、國家未來的投資方向以及國家權力和權威的鞏固。作者進一步指出，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模式依然存在，尤其是南半球——外國資本的投入和國際市場對某些原材料的需求，在塑造國家長期投資模式的歷史發展中起着核心作用，形成邊疆地區與國家、與更廣泛的地區以及與世界的聯繫。因此，作者呼籲學者們關注這種早期資本投資在全球各邊疆地區所形成的「層」。

金家德此書展示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的环境史研究的幾個新趨勢：關注邊

疆地區的生態與族群問題、能源史、工業史等方面的議題，注重檔案資料的使用和闡釋，以及全球意識的潮流激發的環境史新探索。本書主要運用新疆檔案館所藏民國檔案、臺北「國史館」所藏民國檔案、俄羅斯所藏國家經濟檔案等，以1930年代和1940年代為核心，以礦產資源開發為主線，闡釋19世紀末以來在新疆資源開發基礎之上形成、發展、變化的社會經濟「層」，為近代中國邊疆歷史的現代性提供新的認識。

然而，由於作者引用地緣政治分析的視角，結合檔案史料的記載，主要側重於展示新疆的省級官員、地方精英、各帝國權益的代理人、中國中央政府官員和國際市場的代表相互博弈的細節，但卻缺失對新疆本土人群的關照。自乾隆時期以來，新疆天山北麓地區形成連片的農業區和比較穩定的移民社會，而塔城、阿爾泰山一帶則分佈着蒙古、哈薩克等遊牧人群，洞察並思考這些本土人群在近代新疆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的「能動性」，以及他們與各方勢力之間的互動，可能有着更多的闡釋與討論的空間。此外，對區域環境史的深刻理解，還是需要關照區域各個要素，金家德在本書中對近現代以來新疆的大規模的水土開發活動的關注不夠，因此其文中最後闡釋的新疆經濟地理格局有進一步修正的餘地。

郭欣悅、張莉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

**羅兆均，《人神之間：湘黔桂界鄰地區飛山公信仰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38頁。**

《人神之間：湘黔桂界鄰地區飛山公信仰研究》一書是羅兆均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之上修改完成的一部力作。除導論和結語外，全書一共分為六章，分別是：一、族群、祠廟與邊疆治理；二、邊疆治理下的飛山公信仰「標準化」與「正統化」；三、靖州飛山廟：歷史記憶與「總廟」話語；四、人群與神明：村落結構下的家族互動與信仰建構；五、替代與變身：誰是飛山公？六、多元身份變奏：楊再思是誰？全書章節架構的編排緊緊圍繞着飛山公信仰的不同側面逐一展開，邏輯嚴密，層層遞進。

作為「清水江研究叢書」之一，該書以整體的區域的視角，從時間和空間的雙重維度，為我們展示飛山公楊再思如何從唐末宋初以來，經歷不同朝